[中国科技教育史话]

# 历史地理坚守者　行走天下见证沧海桑田
# 中国申遗第一人　百岁晋二臻于天人合一

文 _ 王渝生



**王渝生，中国科学院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科技馆研究员、原馆长。**



侯仁之




侯仁之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2013 年 12 月 4 日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在阿塞拜疆巴库通过决议，正式将中国“珠算”项目列入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中国第 30 项被列为“非遗”的项目。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拥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

喜讯传来，正值中国申遗第一人侯仁之（1911.12.6—2013.10.22）百岁晋二华诞前夕，这是对刚刚辞世不久的这位我国历史地理学开拓者最好的缅怀和永恒的记念。

侯仁之于 1911 年 12 月 6 日生于河北枣强，籍贯山东恩县（现平原县恩城镇）。其父侯天成，任教于枣强县肖张镇抢才学校。母亲刘毓兰没上过学堂，结婚后向丈夫学会了识字、珠算。侯仁之是家中的长子，他出生时刘毓兰已年近 40，父母高兴地为他取名为光临，学名为仁之。侯仁之小时候身体孱弱，经常生病。他的父亲工作忙碌，照顾和教育他的主要是母亲。

1929 年夏，侯仁之初中毕业时，他的母亲病逝。母亲生前希望儿子成为一名教师，母亲的期望激励侯仁之后来走上了从教的道路。

1931 年，20 岁的侯仁之第一次来到北平，乘火车抵达北平正阳门车站。正阳门的箭楼那雄伟的建筑，深厚的城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时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侯仁之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顾颉刚的文章，勉励青年“不要空谈救国”，“要到民间去”，“要把自己的脊梁竖起来，真正去唤醒民众”。侯仁之深受影响，决定师从顾颉刚教授。

1932 年，侯仁之考取燕京大学历史系，从此开始了在燕园长达 81 年的学习、教学和学术研究的生涯。1936 年本科毕业后，留校做顾颉刚的研究生兼助教。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占领北平，顾颉刚离校南下，侯仁之遂转为洪业教授的研究生，此时侯仁之的研究方向已向历史地理学发展。

在燕京大学，侯仁之结识了张玮瑛，二人相恋。1939 年，侯仁之与张玮瑛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举办了简朴的婚礼，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做的证婚人。



侯仁之和他的学生们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宪兵队驻扎在西苑，燕京大学成立了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美国籍教授夏仁德任主席，侯仁之任副主席。该委员会先后秘密协助不少燕京大学学生赴中共的抗日根据地或者重庆国民政府统治的大后方。

1941 年 12 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燕京大学随即遭日本人查封，侯仁之及其他一些燕京大学教授遭日本宪兵逮捕。日本人在监狱中多次对侯仁之审问，侯仁之绝口不提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的事，咬定自己是信基督教的大学教员。

1942 年 6 月，日本人查无实据，只得以“心传心，抗日反日”的罪名判处侯仁之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取保开释。侯仁之保释后，赴天津与妻子张玮瑛会合，在天津定居，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抗战胜利后，侯仁之回到燕京大学。按照洪业教授的安排，侯仁之在 1946 年 8 月赴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学习，成为利物浦大学地理系主任、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达比（Sir Henry Clifford Darby，1909—1992）教授的学生。在达比的指导下，侯仁之取得了新的学术突破，1949 年 7 月获得英国利物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北京的历史地理”。

1948 年夏，留英中国同学会在利物浦大学开会之时，侯仁之购得香港出版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一直保存在身边。留学英国期间，本身并非中共党员的侯仁之成为左翼学生骨干，先后出任中国留英学生会副主席（主席为中共地下党员曹日昌）、中国留英学生会利物浦分会主席。

1949 年 9 月初，侯仁之归国。他持中共旅英党组织的介绍信，到香港找到新华社驻港机构接头，由新华社驻港机构安排乘船北上。1949 年 9 月 29 日，侯仁之抵达北京，随后他和夏仁德教授作为燕京大学的代表于 10 月 1 日在天安门广场上参加了开国大典。

1950 年，侯仁之重返燕京大学任教授，不久搬到燕南园 61 号居住。他的教学风格是不苟言笑，上课时一开口便直奔主题，关键处点到为止，留给学生独立思考的余地。当年，侯仁之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率先奠定了建立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基础。1952 年院系调整，侯仁之改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并且兼任新成立的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主任，自此“历史地理学”正式出现在中国的大学课程中，侯仁之也开始系统的教学和学术研究活动。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初，侯仁之在学术上取得丰硕成果，还开辟了“沙漠历史地理”的研究方向。

1966 年“文革”爆发后，侯仁之受到批斗，罪名是“三家村干将”，因为他曾为吴晗主编的地理小丛书撰写了其中的《徐霞客》和《历史上的北京城》。后来，他又因反对北京大学掌权的聂元梓，被打成“反革命”而停职审查，后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的北京大学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

1972 年，恢复了包括文物考古在内的部分学科的学术研究，侯仁之自此重新开始研究活动。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后，侯仁之重返西北沙区考察。1979 年出版了首部个人学术论文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1980 年，侯仁之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院士）。1981 年，侯仁之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2 年，根据侯仁之、郑孝燮、单士元 3 人的提议，政府设立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一文物保护机制，并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1984 年，侯仁之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进行研究，在妻子的协助下完成了论文《从北京到华盛顿——城市设计主题思想试探》。在康奈尔大学研究期间，侯仁之得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国尚未参加。1985 年“两会”期间，侯仁之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正式提交了自己起草的提案，认为中国政府应尽早批准该公约，并由其他 3 位全国政协委员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共同签名。该提案最终促成 1985 年 11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国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经他努力，1987 年，故宫、长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首批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侯仁之因此被誉为“中国申遗第一人”

1986 年，侯仁之完成了他久已计划的《北京历史地理图集》的编绘出版，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他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体现在《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在北京城市建设的过程中，侯仁之为保护莲花池、万宁桥、卢沟桥等北京古城遗迹、遗址做出了重要贡献。

侯仁之善于思考发现历史地理学术领域的敏感点，并付之于行动，他一直怀揣着一颗赤胆忠心为我国的历史地理与文化保护事业奔走呼吁。从下决心与燕园结下不解之缘，到经历 80 余载风风雨雨，一个满腔热血的知识青年终于锤炼成为一名学富五车的学术巨擘、开一代风气的大师。晚年他说：“新的世纪，现代化的浪潮以前所未有的深广之势席卷全球。自然生态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已成为日益紧迫和不容回避的大问题。我们中华文化素有天人合一的境界，尤其重视人与自然及社会的和谐共存。”真知灼见，字字珠玑。■